

高中英语课堂教师多模态资源运用的超语实践研究

刘焱洋

苏州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苏 苏州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2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3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18日

摘要

超语实践(translanguaging)主张打破语言之间以及语言与其他符号系统之间的界限, 倡导学习者在意义建构过程中调动全部语言与符号资源。语码转换与多模态资源运用是超语实践在课堂中的两种核心表现形式。本研究以高中英语课堂为场域, 聚焦教师的语码转换行为与多模态资源使用策略, 考察其在超语实践框架下的类型、功能及其教学意涵。研究发现, 高中英语教师的超语实践主要体现为语间/语内语码转换、跨符号资源调用及身势语协同三种形式, 其中语码转换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超语类型; 其功能涵盖知识传授、课堂管理、学习参与度监测与师生互动维系四个维度。《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倡导的英语学习活动观与文化意识培养目标为超语实践提供了理念支撑, 而语码转换与多模态资源的策略性整合则为落实课标要求提供了可操作的教学路径。研究进一步分析了语码转换在降低学生认知负荷、营造包容性学习环境中的作用机制, 并就其与全英文教学理念之间的张力提出了辩证思考。

关键词

超语实践, 语码转换, 多模态资源, 高中英语课堂

A Translanguaging Study on the Use of Multimodal Resources by Teachers in Senior High English Classrooms

Yiyang Li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zhou Jiangsu

Received: July 2, 2026; accepted: August 3, 2026; published: August 18, 2026

Abstract

Translanguaging advocates breaking the boundaries between languages and between language and

other semiotic systems, encouraging learners to draw upon all linguistic and semiotic resources in the process of meaning-making. Code-switching and the use of multimodal resources are two core manifestations of translanguaging in the classroom. This study situates itself in senior high English classrooms, focusing on teachers' code-switching behaviors and their strategies for using multimodal resources, and examines the types, functions, and pedagogical implications of these practices within a translanguaging framework.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senior high English teachers' translanguaging practices manifest in three main forms: interlingual/intralingual code-switching, cross-semiotic resource deployment, and embodied semiotic coordination, with code-switching being the most frequent type. The functions of these practices encompass four dimensions: knowledge transmission, classroom management, student engagement monitoring, and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maintenance. The English Learning Activity Approach and the goal of cultural awareness cultivation advocated by the *National English Curriculum Standards for Senior High Schools (2017 Edition, Revised in 2020)*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ranslanguaging, while the strategic integration of code-switching and multimodal resources offers an operational pedagogical pathway for implementing the curriculum standards. The study further analyzes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code-switching reduces students' cognitive load and creates an inclusive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offers a dialectical reflection on the tension between translanguaging and the ideal of English-only instruction.

Keywords

Translanguaging, Code-Switching, Multimodal Resources, Senior High English Classroom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沉浸式外语教学所倡导的单语意识形态在英语课堂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全英文教学被视作理想的教学语言模式。然而，这一理念与我国高中英语课堂的实际情况存在显著张力——学生在语言能力尚不足以支撑全英文理解的情况下，教师若严格恪守英语单语原则，往往导致教学效率下降、学生理解受阻。事实上，在我国所谓的全英文课堂中，教师实际会借助中文进行解释，纯粹的单语教学实践几乎不存在[1]。这一现象引发了学界对课堂语言使用政策的重新审视。

在此背景下，语码转换(code-switching)作为课堂中最显性的语言现象，长期以来备受关注。语码转换指双语者在同一言语事件中交替使用两种或多种语言的现象[2]。在我国高中英语课堂中，教师的语码转换行为极为普遍——从语法讲解时的英汉交替，到课堂管理指令的双语并行，语码转换已深度嵌入教学过程的各个环节。然而，传统研究多将语码转换视为对目标语教学的“偏离”或“干扰”，鲜少将其置于更广阔的意义建构视野中加以审视。

超语实践理论的兴起为重新理解语码转换提供了新的认知路径。超语实践主张打破语言之间、语言与其他符号系统之间的界限，反对以母语者的语言水平作为衡量外语教学质量的标准[3]。该理论视角将课堂中的语码转换、多模态资源使用等看似“偏离”纯英语教学的行为重新界定为学习者意义建构的合法资源。从这一视角出发，语码转换不再是对英语教学的“干扰”，而是教师调动全部语言资源促进理解的策略性行为；多模态资源的运用也不再仅仅是教学的“辅助手段”，而是跨符号意义建构的有机组成部分。

基于此，本研究以超语实践为理论视角，聚焦高中英语课堂中教师的语码转换行为与多模态资源使

用策略,通过课堂观察、半结构化访谈与语料分析,系统考察其类型、功能及其与课程标准理念的关联。

2. 研究背景

2.1. 超语实践的理论内涵与语码转换的定位

超语实践的概念最早由威尔士教育家 Cen Williams 于 1990 年代提出,用以描述威尔士双语教育中教师有计划地交替使用两种教学语言的现象。其后, García 等学者将这一概念从教学策略拓展为理论视角,强调超语实践是一种“超越语言”的意义建构实践——学习者并非在两个独立的语言系统之间切换,而是在一个整合的、动态的语言资源库中调动所需资源[4]。

超语实践与传统的“语码转换”概念存在本质差异。语码转换通常预设两种语言系统是分离的,转换发生在两个系统之间;而超语实践则主张语言资源是相互交融、无边界存在的,学习者的多语能力是一个整体[5]。换言之,语码转换关注的是“在两个语言之间移动”的结构分析,而超语实践不始于识别语码转换,而始于明确“要创造何种意思以及如何创造意思”[6]。这一区别具有重要的教学意涵:语码转换视角下,课堂中的母语使用被视为对目标语的“偏离”;而超语实践视角下,语码转换被理解为多语者意义建构的常规策略之一,与图像、手势、姿态等其他符号资源共同服务于意义的生成与传递。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从语码转换研究到超语实践理论的发展,并非简单的概念更替,而是一次理论范式的根本性转移(paradigm shift)。这一范式转移体现为三个核心层面的转变。其一,从“语言系统分离”到“语言资源整合”——传统语码转换研究以双语者的两种语言为独立系统为前提,关注的是系统之间的“边界”与“跨越”;而超语实践则否定此二分法,主张多语者的全部语言资源构成一个融合的、整体的语库,意义建构不涉及“切换”而涉及“调用”[7]。其二,从“结构描述”到“意义建构”——语码转换研究的核心关切是“转换发生在何处”(即句法位置、语篇节点),追求的是对转换规则的结构性描述;而超语实践则追问“意义如何通过多种符号资源被创造”,将分析重心从语言结构转向意义生成的过程[8]。其三,从“教学干扰”到“教学资源”——语码转换视角将课堂中的母语使用视为对目标语输入的“干扰”或“偏离”[9];而超语实践则赋予母语、多模态、身势语以合法地位,将其视为支持学习者的认知支架与意义资源[10]。这一范式转移不仅重塑了学界对课堂语言使用的理解,也为本研究提供了核心的分析框架。

近年来兴起的“符际超语”(trans-semiotizing)概念进一步拓展了超语实践的研究视野,强调意义建构是多种符号模态协同作用的结果。在英语课堂中,教师使用图片、视频、肢体动作等非语言资源辅助教学,本质上与语码转换具有相同的功能——降低学生理解门槛、促进意义建构。已有研究表明,教师的教学超语实践体现为策略性地整合和协调所有可用的多语言、多模态和多符号资源,以促进意义建构并增强学生对学科知识的理解[11]。

在此基础上,有学者将超语实践进一步细分为语间超语、语内超语、跨符号超语以及身势超语四个层面[12]。其中,语间超语与语内超语对应于传统意义上的语码转换行为,而跨符号超语与身势超语则对应于多模态资源的运用。由此可见,语码转换是多语者超语实践中最核心的语言层面表现,多模态资源则是跨符号层面超语实践的重要载体,二者共同构成课堂超语实践的主体。

基于上述范式转移的脉络,本研究采取超语实践的理论立场,将教师的语码转换与多模态资源使用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具体而言,本研究不再追问“教师是否应该使用母语”或“语码转换是否符合教学规范”等语码转换范式下的问题,而是追问“教师如何策略性地调用全部语言与符号资源以促进学生的意义建构”——这正是超语实践范式所关注的核心议题。在这一框架下,语码转换被理解为教师语言资源调用的策略性选择,多模态资源被理解为跨符号意义建构的有机组成,二者共同服务于课堂教学中意义的生成与传递。

2.2. 超语实践与《课标》理念的对接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简称《课标》）提出的英语学习活动观为语码转换与多模态资源在高中英语课堂中的运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课标》指出，学习活动的设计应体现综合性、关联性与实践性等特点，具体涵盖基于语篇的学习理解类活动、深入语篇的应用实践类活动以及超越语篇的迁移创新类活动[13]。语码转换与多模态资源能够在不同层面的活动中发挥差异化作用：在学习理解阶段，教师可通过语码转换降低学生对复杂语篇的理解门槛；在应用实践阶段，教师可借助多模态资源创设真实实际情境；在迁移创新阶段，学生可调用全部语言与符号资源进行创造性表达。

与此同时，《课标》将文化意识列为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学生应“比较文化异同，汲取文化精华，形成正确的价值观”[14]。语码转换作为连接母语与目标语的语言行为，天然承载着跨文化沟通的功能；多模态资源则为呈现文化内容提供了丰富的感知通道。超语实践理论强调多语资源在意义建构中的协同作用，与课标对跨文化理解与多元文化意识的重视具有内在一致性。

2.3. 高中英语课堂语码转换与超语实践的研究现状

国内高中英语课堂的语码转换研究已有较为丰富的积累。刘蓉和向波阳以黄石市某高中为研究对象，发现英语课堂中教师语码转换具有翻译、节约经济、维持课堂纪律、情感表达、检查理解等多种功能；教师普遍认可语码转换在促进课堂互动与降低学生焦虑方面的积极作用[15]。研究还发现，课堂语码转换具有课堂纪律维持、教学过程需求与师生关系增进三种功能。影响教师语码转换的因素包括课型、任务类型与难度、学生英语水平等客观因素，以及教师个人语言信念、教师英文能力等主观因素。

在语码转换的功能研究方面，已有研究识别出翻译、节约经济、维持课堂纪律、情感表达、检查理解等多种功能[15]。也有研究发现，高中英语课堂中教师语码转换存在过于重视母语作用、语码转换无标记性、使用结构及时机不当等问题[16]。

在超语实践研究方面，国内学者已从宏观理论建构与微观教学实证两个层面展开探索。谢钦和冯德正语视角系统梳理了多模态教学研究的方法论前沿，指出超语实践与多模态资源的整合是当下应用语言学研究的新兴热点，强调多模态分析能够揭示超语实践中多符号资源的协同意义建构机制[17]。在教学效果的量化评估方面，朱茜和李双双采用元分析方法对 27 项教学超语实证研究进行整合分析，发现教学超语对外语教学效果具有中等强度的提升作用，其有效性受教学超语的强弱形式、资源整合方式、学段、地区、实验周期与班级规模等多种因素调节[1]。上述研究表明，超语实践的理论建构与实证验证正在同步推进，为本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参照与效果评估依据。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与方法参照，但多数研究将语码转换与多模态资源分开考察，缺乏对二者协同运用的系统分析。这正是本研究的着力点。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问题

本研究旨在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 1) 高中英语课堂中教师的语码转换与多模态资源运用呈现哪些类型？
- 2) 教师在何种情境下使用语码转换与多模态资源，其教学功能是什么？
- 3) 语码转换与多模态资源的超语实践如何回应《课标》对文化意识培养与英语学习活动观的要求？

3.2. 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为主、量化研究为辅的混合研究取向。研究对象为苏州市某高级中学 3 位英语

教师及其所任教班级的 108 名学生。3 位教师的教龄分别为 3 年、8 年、16 年, 涵盖新手教师、熟手教师与专家教师三个层级。对其各 4 节课(共 12 节)进行课堂观察与录像分析; 学生层面, 对 3 个班级共 108 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 并从中随机抽取 9 名学生(每个班级 3 名, 按英语水平高、中、低分层选取)进行半结构化访谈。

研究方法包括以下四种。(1) 课堂观察: 对教师课堂教学进行非参与式观察, 重点关注教师语码转换行为(中英文使用比例、转换节点、转换方式)、多模态资源(图片、视频、板书、肢体动作等)的使用情况。(2) 半结构化访谈: 课后对教师进行深度访谈, 了解其语码转换与多模态资源使用的教学意图、对超语策略的认知及面临的困惑; 对抽取的 9 名学生进行访谈, 了解其对教师语码转换的接受度、使用偏好与效果感知。(3) 问卷调查: 参照朱晓云等的研究工具, 结合本研究需要自行编制《学生对教师语码转换态度的调查问卷》, 包含 8 个题项, 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形式,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2, 信度良好。问卷于课堂观察结束后发放, 当场回收, 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100%。(4) 语料分析: 将课堂录像转写为文字语料, 采用主题内容分析法对教师的语码转换与多模态资源使用进行编码归类; 学生问卷数据采用 SPSS 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4. 研究结果

4.1. 教师语码转换与多模态资源运用的类型

通过对 12 节课的观察与语料分析, 本研究发现高中英语课堂教师的超语实践可分为以下三种类型(见表 1)。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teachers' translanguaging practice types in senior high English classrooms

表 1. 高中英语课堂教师超语实践类型分布

超语类型	频次	百分比(%)	典型表现
语间/语内语码转换	286	52.3	英汉交替、语体切换
跨符号资源调用	142	26.0	图片、视频、板书图示
身势语协同	119	21.7	手势、表情、身体姿态

1. 语间语码转换与语内语码转换

语间语码转换指中英两种语言之间的交替使用, 是课堂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超语形式(占比 52.3%)。观察发现, 教师在高密度语言知识讲解(如语法规则阐释、词汇辨析)、课堂指令发布、复杂概念解释等情境下普遍使用汉语。例如, 在讲解定语从句的用法时, 一位教师先用英语呈现例句 “This is the book that I read yesterday”, 随即以汉语解释: “同学们注意, 这里的 that 是关系代词, 指代前面的 book, 在从句中作 read 的宾语。”

语内语码转换则指在同一语言内部对不同语体、风格的转换。教师在使用英语授课时, 会根据学生水平在正式书面语与口语化表达之间切换。例如, 教师将 “Please pay attention to the following points” 调整为更口语化的 “Okay, guys, here's what you need to know”。

2. 跨符号资源调用

跨符号资源调用涉及语言系统之外的多模态资源的运用(占比 26.0%), 是语码转换在符号层面的延伸。本研究中, 所有教师均在教学中运用图片、视频、PPT 动画、板书图示等视觉符号。一位教师在教授 “现在进行时” 时, 播放了一段人物正在做各种动作的视频片段, 并配合英语旁白 “He is running. She is singing.”, 图像与语言的协同使用使学生无须依赖母语翻译即可理解语法含义。

板书中的颜色标注、箭头、框图等视觉符号亦是跨符号超语的常见形式。教师使用不同颜色区分句子成分(主语红色、谓语蓝色、宾语绿色),将抽象语法关系可视化,使学生在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之间建立意义的联结。

3. 身势语协同

教师的眼神、手势、面部表情、身体姿态等非语言行为同样构成超语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占比 21.7%)。观察发现,经验丰富的教师能够巧妙地运用手势辅助语言理解:当述说“big”时张开双臂,述说“small”时手指并拢;以点头、摇头配合“Yes/No”提问;以指向性手势引导学生关注板书关键信息。

4.2. 教师语码转换与多模态资源运用的教学功能

基于课堂观察与访谈数据的主题分析,教师语码转换与多模态资源运用的功能可归为以下四个维度(见表 2)。

Table 2. Distribution of functions of teachers' translanguaging practices in senior high English classrooms
表 2. 高中英语课堂教师超语实践功能分布

功能维度	频次	百分比(%)	典型情境
知识传授	215	39.3	语法讲解、词汇释义、语篇分析
课堂管理	168	30.7	发布指令、组织活动、维持纪律
参与度检测	92	16.8	提问反馈、理解检查
互动维系	72	13.2	情感支持、鼓励参与

1. 知识传授功能

此乃语码转换最基础且最主要的功能(占比 39.3%)。教师在讲解语言知识(词汇含义、语法规则、语篇结构)时,借助语码转换与多模态资源降低学生的理解门槛。特别是在处理抽象概念或学生初次接触的语点时,教师往往采用“英语呈现-汉语阐释-多模态示例”的复合超语策略。一位教师在访谈中坦言:“如果全英文讲定语从句,学生根本听不懂,课堂就失控了。先用汉语把规则讲清楚,再回到英语例句,效果反而更好。”

2. 课堂管理功能

课堂管理环节(如发布指令、组织活动、维持纪律、作业布置等)是教师使用语码转换的高频场景(占比 30.7%)。由于课堂管理指令具有“即时性”与“不可误解性”的特点,教师普遍使用汉语或中英双语并行下达指令。例如,分组活动时教师会说:“Now let's work in groups of four.四人一组,讨论一下这两个问题。”此种双语并行模式确保了信息传达的效率与准确性。

3. 学生参与度监测功能

教师运用语码转换判断学生的理解程度(占比 16.8%)。当教师以英语提问后发现学生面露困惑或无人回应时,会转而以汉语重复问题或补充解释。学生认为课堂语码转换有助于缓和紧张情绪,且教师的教学性语码转换能够有效促进学生对英语语言和文化的了解。

4. 师生互动维系功能

教师在课堂互动中使用语码转换具有社会情感功能(占比 13.2%)。当学生以英语回答遇到困难时,教师以汉语给予提示或鼓励(如“没关系,你先用中文说”),能够降低学生的焦虑感,维护课堂参与的安全感。有研究指出,教学超语通过构建包容性环境,提升学生参与主动性与内容保持效果[18]。

4.3. 教师语码转换与多模态资源运用的特征

本研究的发现揭示了高中英语教师语码转换与多模态资源运用的两个突出特征。其一，与英语学习活动观的呼应。观察发现，教师在不同类型的课堂活动中差异化地运用语码转换与多模态资源。在学习理解类活动中，语间语码转换的使用频率最高(占比在该类活动中达 58.6%)，教师通过汉语阐释帮助学生理解语篇主旨与细节信息；在应用实践类活动中，跨符号资源调用的使用增多(占比 42.3%)，教师借助图表、视频等创设情境，引导学生进行描述、阐释与交流；在迁移创新类活动中，身势语协同与语内语码转换则更多地为学生的创造性表达提供支架。其二，“全英文要求”与超语实践之间的张力。访谈中，三位教师均表达了相似的困惑：一方面，学校的教学理念与公开课评价标准倾向于鼓励全英文教学；另一方面，实际教学中离开母语或多模态辅助，学生理解效率明显下降，此种张力使教师在“理想要求”与“现实需求”之间不断权衡。

进一步审视这一张力，其深层根源在于语言意识形态与教学现实需求之间的冲突。全英文教学的倡导植根于“最大输入、最大输出”的二语习得假说，其合理性建立在“学生具备一定基础理解能力”的前提之上。然而，我国高中英语课堂的学生语言水平参差不齐，相当一部分学生尚处于基础英语阶段，全英文教学所预设的“理解-吸收-产出”链条在实际课堂中往往断裂为“不理解-焦虑-放弃”的负向循环。面对这一困境，多数教师在实践中选择了“策略性背离”——在公开课等被观察场景中保持较高的英语使用比例，在日常教学中则更为灵活地调用语码转换(据访谈)。此种“公开课表现”与“日常实践”的割裂，不仅是教师个体的教学选择，更是评价机制与教学实际脱节的表征。因此，突破“全英文”与“超语”的二元对立，建立以教学有效性为评价标准的课堂语言使用原则，是化解这一张力的关键所在。

4.4. 学生对教师语码转换态度的调查结果

为获取学生视角的实证数据，本研究在课堂观察与教师访谈的基础上，对 3 位教师所任教的 3 个班级共 108 名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并从中随机抽取 9 名学生(每个班级 3 名，按英语水平高、中、低分层选取)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调查与访谈围绕学生对教师语码转换的接受度、使用偏好及效果感知展开。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见表 3)，学生对教师语码转换的整体接受度较高，72.2%的学生同意或非常同意“语码转换有助于理解课堂内容”。然而，学生的态度呈现显著的水平分层特征：85.7%的英语薄弱组学生(前测成绩低于 90 分，满分 150 分)表示“希望教师多使用中文解释复杂知识点”，而仅有 23.5%的高水平组学生(前测成绩高于 120 分)持相同看法。在“汉语解释会打断英语语感”这一问题上，高水平组中有 47.1%的学生表示认同，而薄弱组中仅有 8.6%认同。此外，64.8%的学生表示“期待教师用中文重复英语提问”，这一比例在高水平组中为 29.4%，在薄弱组中高达 88.6%。

Table 3. Questionnaire results of students' attitudes towards teachers' code-switching (N = 108)

表 3. 学生对教师语码转换态度的问卷调查结果(N = 108)

调查项目	高水平组(n = 34)	中等水平组(n = 38)	薄弱组(n = 36)	全体(%)
语码转换有助于理解课堂内容	70.6%	76.3%	94.4%	72.2
希望教师多使用中文解释复杂知识点	23.5%	52.6%	85.7%	54.6
汉语解释会打断英语语感	47.1%	31.6%	8.6%	28.7
期待教师用中文重复英语提问	29.4%	76.3%	88.6%	64.8

半结构化访谈进一步揭示了学生的深层态度。一位高水平学生表示：“老师用中文解释语法的时候，我其实已经听懂了英语的部分，中文重复反而让我走神。”另一位中等水平学生则说：“有时候老师全

英文讲课文,我只能听懂大概,但老师用中文点一下关键词,我就完全明白了。”而一位薄弱组学生坦言:“如果没有中文,我根本不知道老师在讲什么,整节课都会很焦虑。”

上述数据表明,学生对语码转换的需求与偏好呈现显著的水平分层特征。这一发现印证了关于“学生英语水平是影响语码转换效果的关键变量”的论断,也为教师差异化运用超语策略提供了实证依据。

5. 讨论与分析

5.1. 以语码转换为核心的超语实践:从“偏差”到“资源”

本研究结果支持将语码转换重新界定为教学中的合法资源而非应予避免的“偏差行为”。从语言学视角审视,课堂中的语码转换并非语言能力的缺陷表征,而是双语使用者自然且复杂的语用策略。高中英语课堂的语码转换具有高度的规律性与功能性——教师基于对学生语言水平的判断、教学内容的难度、课堂互动的情境等因素,灵活地“调配”语言资源,以实现教学效益最大化。

在超语实践的理论框架下,语码转换不再是孤立的教学行为,而是与跨符号资源、身势语协同构成一个完整的意义建构系统。教师在同一教学环节中往往同时调动多种超语资源——语码转换传递核心语义信息,视觉符号提供情境化理解线索,身势语强化互动参与——三者协同作用,共同降低了学生的认知负荷。

5.2. 知识层面与价值层面的张力

从整体分布来看,教师超语实践的功能以知识传授和课堂管理为主,合计占比达 70.0%,而在促进学生的跨文化理解、价值判断与情感共鸣等深层培养方面的功能占比相对有限。这表明超语实践在高中英语课堂中的运用仍以认知层面的知识传递为主导,较少深入到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层面。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教师在跨文化内容教学中的超语实践多集中于事实性文化知识的传递(如节日习俗、名人介绍等),而较少引导学生进行文化比较、价值反思或立场表达。这提示教师虽能有效运用超语实践服务知识传授,但在落实课标所要求的“比较文化异同、形成正确价值观”方面仍有提升空间。

与此同时,超语实践在高中英语课堂中的运用亦存在一定局限与争议,需加以审慎审视。

其一,超语实践可能弱化英语语言输入量。尽管语码转换能够降低学生的认知负荷,但过度依赖母语阐释可能减少学生接触目标语的机会,进而影响语言习得所需的输入频率与强度。本研究中,教龄 3 年的新手教师的课堂英语使用比例(约 55%)显著低于教龄 16 年的专家教师(约 72%),其学生虽在课堂理解层面表现良好,但在听力辨音与口语即时反应方面相对薄弱。这一现象提示,超语实践的策略性运用需在“可理解性”与“输入充分性”之间寻求平衡,而非不加区分地以母语替代目标语。

其二,超语实践可能弱化学生的语言输出动力。研究表明,当教师频繁使用语码转换时,学生可能产生“母语依赖”心理,倾向于期待教师的汉语提示而非主动调动英语资源进行表达。本研究的访谈中,三位教师均提及“有些学生习惯了我说中文,哪怕我刚刚用英语讲完,他们也要再问一遍中文意思”,这一现象反映了超语实践在降低焦虑的同时可能抑制学生的认知努力与语言产出意愿。教师在课堂中无标记性的语码转换可能导致学生对语言选择的敏感度下降,不利于英语思维习惯的养成。

其三,学生对语码转换的态度存在显著的水平分层特征。问卷调查结果表明,英语薄弱组学生高度依赖教师的汉语辅助(85.7%希望多使用中文解释),而高水平组学生则更关注英语语感的保持(47.1%认为汉语解释会打断语感)。访谈中高水平学生直言“中文重复反而让我走神”,薄弱组学生则表示“没有中文根本听不懂,整节课都会很焦虑”。这一发现印证了“学生英语水平是影响语码转换效果的关键变量”的论断,同时也揭示了教师在超语策略选择上面临的现实困境——过度简化语言可能对高水平学生的语言发展构成制约,而维持较高英语难度又可能使低水平学生难以跟进。此种差异化的需求对教师的超语

实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需在充分了解班级学生水平分布的基础上，寻找“可理解性”与“认知挑战性”之间的动态平衡点。

5.3. 与课程标准的契合度

《课标》强调通过语言学习提升学生的跨文化理解能力与全球语境中的沟通能力。研究发现，教师的语码转换与多模态资源运用在“跨文化情境的知识传递”“有效沟通”及“课堂参与”等维度上呈现良好。特别是教师通过语码转换引导学生对比中英文语言表达差异、借助多模态资源呈现文化情境，使语言学习与社会情境认知相结合。这与课标中倡导的“在跨文化交流中形成理解”的培养目标相契合。

然而，“识别并分析多重观点”与“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在超语实践中体现相对有限。教师虽在课堂中使用语码转换进行讲解，但讨论环节的问题设置仍偏向单一观点呈现，缺乏引导学生对多元文化立场进行深度比对和反思。全球胜任力教育强调对复杂议题进行多角度审视，因此，在课堂互动中进一步强化对立观点分析、论证性表达训练，将有助于学生更充分达成课标所要求的高阶思维能力与全球视野发展。

5.4. 显性 - 隐性相结合的超语实践呈现方式

从呈现形式的角度来看，教师超语实践在显性与隐性两个层面发挥作用。语言讲解与文本输入属于显性形式，而活动与任务设计则属于隐性形式。研究发现，教师语码转换在显性层面主要通过英汉对照讲解、多模态资源展示等方式呈现文化内容与语言知识，为学生理解全球议题和跨文化情境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教师通过任务型活动、小组讨论等隐性形式，借助语码转换为学生提供互动与反思的机会，促进其将认知转化为态度与行动。例如，在跨文化主题讨论中，教师允许学生用中文表达深度思考，再引导其转化为英文输出，体现了从“学语言”到“用语言理解世界”的教学理念。

显性与隐性形式的结合增强了超语实践的教育层次与开放性，符合现代教材与教学从语言学习走向价值塑造的趋势。然而，隐性部分在深度与系统性上仍有提升空间，如部分活动仅停留在“表达观点”层面，缺乏对价值冲突与文化多样性的深入探讨。

6. 结语

本研究基于超语实践理论框架，分析了高中英语课堂中教师语码转换与多模态资源的运用。从类型来看，语码转换是最核心的超语类型(占比 52.3%)，跨符号资源调用(26.0%)与身势语协同(21.7%)共同构成了课堂超语实践的多通道系统。从功能来看，知识传授(39.3%)与课堂管理(30.7%)占据主导，参与度监测(16.8%)与互动维系(13.2%)亦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研究发现揭示了三个方面的特征。其一，在超语实践的性质上，语码转换应从对教学的“偏离”重新理解为教学中的合法资源，与跨符号资源、身势语协同构成完整的意义建构系统。其二，在知识与价值的维度上，超语实践的知识传授功能占据绝对优势，而在促进跨文化理解、价值判断与情感共鸣等深层培养方面仍有提升空间，教师在落实课标对“比较文化异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要求方面尚需进一步努力。其三，在呈现方式上，教师通过显性语言讲解与隐性任务设计相结合的方式运用超语实践，形成认知 - 态度 - 能力的链式发展，但部分隐性任务在深度与多样性上仍有改进余地。其四，在与课程标准的契合度上，教师在跨文化情境知识传递与课堂参与促进方面表现良好，但在批判性思维培养与多视角分析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同时应认识到，超语实践在课堂中的运用并非毫无争议。学生问卷调查表明，学生对语码转换的需求呈现显著的水平分层特征——英语薄弱学生高度依赖汉语辅助，而高水平学生则认为过度使用汉语会

打断英语语感。过度依赖母语阐释还可能弱化英语输入量, 频繁的语码转换亦可能抑制部分学生的语言输出动力。因此, 教师应在充分评估学生语言水平、教学任务类型与认知负荷的基础上, 有针对性地调用超语资源, 在“支架”与“自主”之间实现动态平衡, 使超语实践真正服务于学生语言能力发展的长远目标。

总体而言, 高中英语课堂中语码转换与多模态资源的超语实践运用体现了教师应对教学现实挑战的教学智慧, 也回应了《课标》对英语学习活动观与文化意识培养的要求。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自觉地整合语码转换与多模态资源, 不仅降低了学生的认知负荷, 也为构建包容性的课堂语言环境提供了可能。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关注超语实践与课堂教学的深度衔接, 探讨教师如何通过系统性的超语策略将教材中蕴含的文化内容有效转化为学生的跨文化理解与全球视野, 从而推动核心素养导向下英语教学的深入发展。

参考文献

- [1] 朱茜, 李双双. 外语教学中教学超语有效性的元分析[J]. 外语界, 2026(1): 49-57.
- [2] Myers-Scotton, C. (1993) *Social Motivations for Codeswitching: Evidence from Africa*. Clarendon Press. <https://doi.org/10.1093/oso/9780198239055.001.0001>
- [3] García, O. and Wei, L. (2014) *Translanguaging: Language, Bilingualism and Education*. Palgrave Macmillan. <https://doi.org/10.1057/9781137385765>
- [4] 秦永丽, 王平. 国际超语研究动态与发展趋势预判[J]. 外语界, 2021(2): 81-89.
- [5] Wei, L. (2017) *Translanguaging as a Practical Theory of Language*. *Applied Linguistics*, 39, 9-30. <https://doi.org/10.1093/applin/amx039>
- [6] Li, W. (2022) *Translanguaging as a Political Stance with Implications for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ELT Journal*, 76, 172-182.
- [7] 李巍, 沈骑. 超语实践理论的起源、发展与展望[J]. 外国语, 2021, 44(4): 2-14.
- [8] 王平. 语码转换与超语对比及其启示[J]. 外语研究, 2020, 37(2): 56-62.
- [9] 杨晓萱. 高中优秀英语教师课堂用语语码转换的个案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南宁: 广西民族大学, 2024.
- [10] Lin, A.M.Y. (2018) *Theories of Trans/Languaging and Trans-Semiotizing: Implications for Content-Based Education Classroom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 22, 5-16. <https://doi.org/10.1080/13670050.2018.1515175>
- [11] He, Y. and Zhou, X. (2024) *Facilitating Content Learning through Translanguaging in Secondary EMI Science Classroom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34, 1012-1031. <https://doi.org/10.1111/ijal.12550>
- [12] 张学明. 初中英语课堂超语实践及教师观念的案例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南京: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2025.
- [13] 俞希, 王守仁. 核心素养导向的高中英语课标词汇修订与教学路径探析[J]. 当代外语研究, 2026(3): 95-105.
- [14] 教育部.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S].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20.
- [15] 刘蓉, 向波阳. 英语课堂教师语码转换功能探析——以黄石市某高中为例[J]. 湖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40(4): 128-132.
- [16] 黄秀莹. 高中英语教师课堂语码转换的调查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烟台: 鲁东大学, 2013.
- [17] 谢钦, 冯德正. 超语视角的多模态教学研究: 方法与前沿[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6, 34(2): 73-79.
- [18] Putra, H.S., Sugiharto, S., Silva, A.M.D. and Syahrizal, T. (2025) *Pedagogical Translanguaging in Language Education: Constructing Translanguaging Space to Reduce Cognitive Load in Suppor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nguage Education*, 9, 656-675. <https://doi.org/10.26858/ijole.v1i1.77403>